

2016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级重点项目“印度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措施研究”
(编号KYQD201603)阶段性成果之一

“9·11”事件后 美国国家安全观与“反恐”

U.S. National Security Doctrine and Its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y after 9/11 Attacks

安高乐◎著

非外借

时事出版社

“9·11”事件后 美国国家安全观与“反恐”

U.S. National Security Doctrine and Its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y after 9/11 Attacks

安高乐◎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观与“反恐”/安高乐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195-0130-3

I. ①9… II. ①安… III. ①国家安全—研究—美国 IV. ①D771.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5960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88547592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7 字数: 228 千字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凸显及恐怖主义的危害	(17)
第一节 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凸显及扩散	(17)
第二节 恐怖主义及其对 21 世纪国际安全的冲击	(24)
第二章 “9·11” 后美国国家安全观	(36)
第一节 “9·11” 袭击对美国国家安全观的影响	(36)
第二节 “先发制人” 战略的提出	(50)
第三节 “先发制人” 战略的结构因素：物质和观念因素的 结合	(59)
第三章 师出有名：美国国内“反恐”立法	(75)
第一节 《使用武力授权法》	(75)
第二节 《授权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决议》	(81)
第三节 《爱国者法案》	(83)
第四章 美国与南亚“反恐战争”：以巴基斯坦为 中心	(89)
第一节 美巴对合作“反恐”的认知	(90)

第二节 美巴“反恐”合作机制、过程及成效	(104)
第三节 巴基斯坦在美国“反恐”中的地位	(125)
第五章 美国东南亚“反恐”：以印尼为中心	(141)
第一节 美印（尼）对合作“反恐”的权衡	(142)
第二节 “刚性反恐”：美—印尼“反恐”合作领域及 成效	(154)
第三节 印尼“柔性反恐”措施及美国的反应	(162)
第六章 美国中东“反恐”：以沙特阿拉伯为中心 ...	(170)
第一节 美沙对合作“反恐”的利益需求	(172)
第二节 美国和沙特的“反恐”合作领域	(184)
第三节 沙特“柔性反恐”措施：去极端化（PRAC） ...	(194)
第四节 沙特的“柔性反恐”特征及美国的反应	(206)
第七章 大国合作与美国“反恐”前景.....	(215)
第一节 美国—印度“反恐”合作	(215)
第二节 美国—俄罗斯“反恐”合作	(219)
第三节 美国—欧盟“反恐”合作	(229)
结语	(234)
参考文献	(238)
后记	(265)

导 论

“9·11”事件作为国际安全研究的重要驱动力不仅凸显了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人类的危害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念，使其一改冷战期间将主要大国作为头等威胁的思维，转变为将恐怖主义以及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结合视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正是在这一新的安全观的指导下，美国决定发动始于阿富汗的全球“反恐战争”。由于恐怖主义是一种遍及全球的威胁，美国不能匹马单枪加以应对，因此必须寻求“反恐”盟友。南亚的巴基斯坦由于地缘位置的特殊性，加之其在抵抗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与“圣战”运动及其后来的塔利班结下了特殊的关系，因此美国主导的西方“反恐”联盟将其视为前线国家；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第一大穆斯林人口国，美国与印尼合作可以撇清美国“反恐”主要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批评；沙特阿拉伯是逊尼派穆斯林的实际领导国，与美国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美国与沙特结成“反恐”联盟可以限制恐怖主义的资金来源。巴基斯坦、印尼和沙特阿拉伯基于自身特殊的国家利益选择与美国合作“反恐”。印尼和沙特阿拉伯除与美国共同采取的“刚性反恐”措施外，还采取“柔性反恐”措施——“去极端化反恐”措施，并得到美国的鼓励和支持。美国—巴基斯坦、美国—印尼、美国—沙特对合

作“反恐”的利弊权衡、“反恐”合作的领域及“反恐”合作的成效是本书探讨的主要内容。此外，美国还与印度、俄罗斯、欧盟等大国和国家集团进行合作“反恐”，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本书概况

冷战期间的国际安全研究主要集中于战略（军备竞赛、裁军和核威慑等）研究，冷战结束后，由于非传统安全威胁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国际安全研究的重点从战略研究转向和平研究，尤其是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研究。冷战后对安全研究的文献主要包括两大趋势：一是以军事为主要内容的新“传统主义”的路径研究，二是将安全概念进行扩展和深化的各种非传统安全视角，两种研究路径都强调国际关系的驱动力（大国政治、技术、事件、学术争论、制度化）研究。在上述五种驱动力研究中，重大事件，尤其是突发事件虽然只是一个偶然因素，但却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大国的地区战略甚至全球战略，“9·11”袭击事件便是突出一例。该事件彰显了非传统国际格局对传统两极格局的冲击，也向世人昭示了恐怖主义对人类的危害性及国际共管的必要性；同时它也改变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念和全球战略，使美国不再将其他传统大国视为目前的主要威胁，而是将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视为迫在眉睫的威胁。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捍卫经济利益以及推广美国的价值观，美国决定发动全球“反恐战争”，其重点主要集中在南亚、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南亚的巴基斯坦拥有特殊的地缘位置，并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因而美国将其

视为“反恐”前线国家。从巴基斯坦的角度来看，其选择与美国结成“反恐”联盟可以化解印度借机联合美国孤立巴基斯坦的压力，避免克什米尔地区的“自由战士”被定义为恐怖主义者而遭到打击，获得美国巨大的经济援助，提升其军事装备以抗衡印度的能力，以及推动穆沙拉夫所主张的世俗化改革。因此，穆沙拉夫政府在顶住国内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支持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并在“反恐”中进行全面的合作。

东南亚地区从传统上来看与“基地”组织的联系并不紧密，但自20世纪前半期起，“基地”组织就大举进入东南亚地区，并帮助当地建立包括“伊斯兰祈祷团”在内的宗教极端组织。“伊斯兰祈祷团”的活动范围遍及东南亚各国，所实施的恐怖活动给该地区各国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众多的人员伤亡。2002年10月12日，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发生的恐怖事件激起了全国对恐怖主义的憎恨，也使印尼民众充分认识到恐怖主义的危害性并支持政府与美国合作“反恐”的决定，此后美国—印尼在多个领域开展合作并取得一定的成效。除了与美国合作外，印尼还以地区国际组织“东盟”为平台开展多边合作。

中东地区是东西方的交通枢纽、扼守海上重要通道、富含已探明世界石油储量的 $\frac{2}{3}$ ，具有重要的地缘优势。该地区的沙特阿拉伯是美国的传统盟友，是美国石油供应的稳定器和巴以和平协议的倡导者，但该国的富豪和慈善机构是世界各地恐怖主义的主要捐赠者。因此，美国将沙特作为“反恐”盟友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切断恐怖主义的资金来源，又可以将沙特作为调节器来稀释中东的反美情绪，从而维护自身和以色列的利益。另一方面，沙特自身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通过与美国结盟“反恐”可以维护其安全和促进经济利益。

印尼和沙特除了采取武力“反恐”措施以外，也采取

“柔性反恐”措施并取得显著成效，尤其是两国的“去极端化反恐”措施成为世界“反恐”的成功范例，值得世界各国学习和借鉴。

二、研究现状

“9·11”袭击事件对世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全球战略、安全政策、“反恐”战略等。由于美国是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以至于美国因“9·11”这一重大袭击事件在南亚、东南亚和中东等地区发动“反恐战争”。这一“反恐战争”牵动着在地缘上与此相关各国的神经，由此围绕美国“反恐战争”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国内学术机构对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进行研究，取得了较多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了解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活动泛滥的原因、理解恐怖主义现象以及了解国际社会“反恐”斗争的现状大有裨益。

中国国内学术界在该领域较有代表性的著述包括：《人、国家与安全治理：国际关系中的非传统安全理论》（李开盛主编，2012）、《国际安全理论经典导读》（阎学通、徐进，2009）、《美国国家安全》（萨克宣，2005）、《恐怖主义溯源：中国人的视角》（王逸舟，2010）、《恐怖主义与反恐怖历史：理论与实践》（张家栋，2012）等。

中国国内就美国“反恐”战略进行研究的代表性学术论文包括：《“9·11”事件后美国反恐战略对南亚安全格局的影响》（张力，2006）、《南亚反恐局势的特点及走向》（赵伯乐，2009）、《反恐战略、“倒萨”战争与美国的石油争夺》（吴磊，

2003)、《浅析美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反恐新战略》(刘锦前, 2009)、《后拉登时代美国的反恐战略及影响》(刘元玲, 2011)、《〈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大国关系》(杨洁勉, 2002)、《“9·11”事件后美国反恐战略的演变》(李希若, 2008)、《美国调整南亚反恐战略: 观察与预测》(张力, 2009)等。

研究美国—巴基斯坦“反恐”合作的文章包括:《美巴反恐合作的援助——代价之争》(张力, 2012)、《美巴反恐合作: 困境与前景》(邓红英, 2009)、《美国—巴基斯坦十年反恐合作: 进程、困境与反思》(陈利君, 2011)、《小布什时期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反恐合作评析》(熊昊, 2010)、《后拉丹时代美巴关系走向探析》(杨文静, 2011)、《新阶段反恐战争: 巴基斯坦的处境与美巴矛盾》(张力, 2008)、《“扎尔达里时代”美巴反恐合作的制约性因素分析》(谢许潭, 2009)等。

研究美国—印尼合作“反恐”的学术论文包括:《美国的东盟政策解析》(唐昊, 2005)、《东南亚地区的反恐形势与安全合作努力》(汪新生, 2004)、《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与东盟的关系》(曹云华, 2002)等。关于美国—沙特阿拉伯“反恐”合作的学术论文包括:《世界大事综览》(刘钰, 2009)、《“亚非地区: ‘9·11’的冲击与影响”学术研讨会综述》(王亚宏, 2002)等。关于美国—印度合作“反恐”的论文有:《美印之间的反恐合作》(时宏远, 2009)、《美国与印度的反恐合作: 内容、问题与前景》(邵育群, 2009)等。

对美国—俄罗斯“反恐”合作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包括:《反恐合作与俄罗斯对美国政策取向》(刘飞涛, 2002)、《俄罗斯反恐的国际合作》(刘勇为, 2008)、《美俄关系十年》(刘金质, 2002)、《俄罗斯国家身份定位与认知视角下的俄美

关系困境》(张学航, 2009)等。研究美国—欧盟“反恐”合作的主要学术论文包括:《欧盟 AEO 指南详解》(王春蕊, 2012)、《美欧反恐合作机制的有效性及其限制因素》(王民丽, 2011)、《当前国际恐怖与反恐斗争的特点与趋势》(李伟, 2007)、《全球化与恐怖主义》(张东升, 2002)等。

国外学者对恐怖主义及“反恐战争”的研究较多,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遭到了恐怖主义不同程度的袭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学界也不断产生出新的研究成果。许多学者在相关的国际问题、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刊物上发表了关于恐怖主义及“反恐战争”的文章。

国外对本书所涉主题的研究较多,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西方的研究。

由于“反恐战争”代替冷战上升为国际安全中最重要的问题,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将安全研究重点从冷战期间的战略研究(军控、裁军和核威慑)扩展和深化到非传统安全领域,尤其是“反恐”领域,以若干著名高校、智库和研究所为依托,形成了教学、研究和提供政策咨询三位一体的研究模式。主要包括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院、斯坦福大学政治学院、密歇根大学政治学院、耶鲁大学政治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院伯克莱分校、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杜克大学政治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院洛杉矶分校、芝加哥大学政治学院和肯尼迪政治学院、安德鲁斯大学等。研究所和智库有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学会、美国传统基金会、史汀生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会、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伦敦国际问题研究所、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中心、福特基

金会等。其中美国新保守主义智库，如企业研究所和由布拉德利、约翰·奥林、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支持的“新美国世纪”项目等对布什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① 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布朗大学沃森研究所的“和平研究项目”通过一系列会议、电影、博客以及广泛的网络来研究恐怖主义、全球“反恐战争”，并试图找出暴力冲突与媒体间的关系。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通过提倡“恐怖主义的国内对策”和“新安全挑战项目”，为研究人员提供支持。总体来看，西方的研究既重视政策研究，又重视学理研究；既从切身利益和安全战略出发，又有不少研究是针对美国和英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为借口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批评。从价值取向上来看，西方的研究体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特点。

西方的研究颇多，难以全面检索和完全归纳，特选择与本书直接相关的重要著作分别简略介绍。在对国际安全和“反恐”进行研究的著述中，巴里·布赞和琳娜·汉森的《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2011）是一部重要著作。该书的作者巴里·布赞和琳娜·汉森认为，国际安全研究中认识论差异大体有二：一是客观安全、主观安全和话语安全的差异；二是安全分析所采用路径的差异。在第一种差异中，客观安全概念往往立足于物质层面，强调威胁者的物质能力；主观安全概念通常指观念上的威胁，强调心理上的认知；话语安全强调安全是自我指涉的实践，是一种“言语行为”（speech act），是“安全威胁”的话语建构。在第二种差异中，安全分析路径的区别主要是实证主义与后实

① Max Boot, “Think Again: Neocons,” *Foreign Policy*, Issue 140, 2004, pp. 20–28.

证主义的区别。^① 作者还阐释了传统主义、深化和扩展视角对“9·11”事件的研究：传统主义者认为“9·11”事件恢复了对“使用武力”作为安全核心的焦点，但它与冷战期间的军备、威慑和裁军等路径又大相径庭，主要体现在恐怖主义从冷战时期的边缘地位上升到中心地位。^② 扩展和深化路径的学者认为，安全是一个被建构起来的话语，而不是把安全作为一个客观的物质条件。“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者”并不是客观认定的威胁、行为或行为体，而是对极端他者的建构。^③

就恐怖主义的危害、美国的“反恐”措施、国际“反恐”合作和如何与“支恐国家”，以及“反恐”伙伴相处等进行研究的著述中，《恐怖主义与美国的外交政策》（*Terrorism and U. S. Foreign Policy*, 2001）一书阐述得比较全面和深入。作者保罗·R. 皮拉尔认为恐怖主义给美国安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④ 此外，皮拉尔还阐释了美国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目标的主要原因，列举了恐怖主义组织的种类等。

认为巴基斯坦在美巴“反恐”合作中的努力不尽如人意的代表作有《巴基斯坦与“反恐战争”：冲突的目标和折中的表现》（*Pakistan and the War on Terror: Conflicted Goals, Compromised Performance*, 2008），该书的作者阿希利·J. 特利斯（Ashley J. Tellis）认为，美国从2002—2008年向巴基斯坦提供了100亿美元的安全和经济援助，但巴基斯坦在“反恐”中的

① 巴里·布赞、琳娜·汉森著，余潇枫译：《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导读一，第7页。

② 同上书，第246页。

③ James. Der Derian, “Imaging terroe: Logos, Pathos and Etho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6, No. 1, 2005, pp. 23-37.

④ Paul R. Pillar, *Terrorism and U. S. Foreign Policy*,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 C., 2001, p. 1.

贡献还是令美国会感到失望。美国的莱昂·T. 哈达尔 (Leon T. Hadar) 在其文《美国“反恐战争”中的巴基斯坦：战略盟友还是不可靠的客户?》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巴基斯坦支持美国“反恐战争”的决定并不意味着巴外交政策结构性的变化，而是巴不希望失去政权更替后的阿富汗，也不希望克什米尔地区的“自由战士”被划为恐怖主义者而遭到印度和美国的打击，同时希望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以便提升对抗印度的能力，因此穆沙拉夫的决定是策略性的考虑。同时作者认为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是大国被小国利益所绑架。^①

当然，在对巴基斯坦的“反恐”表示批评的同时，也有不少美国学者对巴在“反恐”合作中所做贡献还是予以肯定的。K. 阿兰 (K. Alan Kronstadt) 对美巴在执法、情报、军事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成效给予了肯定。^② 他在文章《美巴“反恐”合作》(*Pakistan-U. S. Anti-Terrorism Cooperation*) 中写道：“巴基斯坦是美国主导的‘反恐’联盟的重要前线国家。由于巴基斯坦在联合‘反恐’行动中给予美国很大的支持，美国部分高级官员经常赞扬巴基斯坦及其领导人穆沙拉夫。”^③

研究美国—印尼“反恐”合作的文献主要集中讨论美印军事、安全和推广民主等领域的合作，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室副主任穆雷·希伯特 (Murray Hiebert) 等人在《美国—印尼 2020 年伙伴关系报告》中对美国—印尼合作“反恐”做了全面的探讨，并对两国伙伴关系的前景提出一些参考

① Leon T. Hadar, “Pakistan in America’s War against Terrorism Strategic Ally or Unreliable Client?” Policy Analysis, No. 436, May 8th, 2002, pp. 1–22.

② K. Alan Kronstadt, “Pakistan-U. S. Anti-Terrorism Cooperation,” Report for Congress, March 28th, 2003, pp. 1–16.

③ Ari Fleischer, “Transcript: White House Daily Briefing,” USIS Washington File, March 3rd, 2003.

意见^①。曾在印尼工作过十年的前美国国防和军事武官(1990—1994)约翰·B. 黑斯曼(John B. Haseman)对美印安全关系进行了探讨,他在《美印安全关系:下一步的展望》(*The U. S. -Indonesia Security Relationship: The Next Steps*)一书中阐明美印安全合作能使双方互利共赢。关于东南亚恐怖主义问题,梅丽莎·G. 柯利(Melissa G. Curley)在其著作《安全化与东盟“反恐”合作的挑战》一书中分析了东盟地区各国如何将“反恐”问题列入政治议程,并讨论区外国家美国在推动这一议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她用巴里·布赞所构筑的地区安全符合理论来分析东南亚的恐怖主义,并探究了美印“反恐”合作的动因。

在对美国—沙特阿拉伯“反恐”合作研究的文献中,克雷格·昂格尔(Craig Unger)的《布什家族和沙特王族》(*House of Bush, House of Saud: The Secre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ld's Two Most Powerful Dynasties*, 2004)探究了布什家族和沙特王族之间的关系。昂格尔认为由于布什家族和沙特王族之间紧密的经济关系,两国在30年前自然而然地建立了“反恐”合作基础。约瑟夫·M. 迈尔斯(Joseph M. Myers)在参议院证词中将美沙关系概括为亦敌亦友、复杂而又非常重要的关系,两国力求追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使冲突最小化。^② 托马斯·李普曼(Thomas Lippman)从机制的视角积极探讨美沙关系,他在《海市蜃楼:脆弱的美沙伙伴关系》(*Inside the Mirage: America's Fragile Partnership with Saudi Arabia*, 2004)一书中强

① Murray Hiebert, Ted Osius, *A U. S. -Indonesia Partnership for 2020: Recommendations for Forging a 21st Century Relationship*,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p. 1-92.

② Joseph M. Myers, testimony on combating terror financing and U. S. cooperation with Saudi Arabia, U. S. Senate Committee on Finance Hearing on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July 15, 2004.

调各种组织机构在建构美沙关系中的作用，这些组织包括美国和沙特之间商业集团（如石油集团）和政府组织如国家航空公司、农业和军事服务集团等。他认为各种利益集团参与了两国关系的建构，因而这种互利共赢的关系反过来也制约着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从领导人物个人层面来阐述美国—沙特阿拉伯关系的以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ips）为代表，其作品《美国王朝：贵族、财富和布什家族的欺骗政治》（*American Dynasty: Aristocracy, Fortune, and the Politics of Deceit in the House of Bush*, 2004）阐述了老布什与沙特王族的私交，及其在离任后数次造访沙特的情景。

西方文献除了有关美巴、美国—印尼，以及美国—沙特阿拉伯的刚性合作“反恐”外，也有不少文献涉及到印尼和沙特阿拉伯的“柔性反恐”，尤其是关于印尼和沙特阿拉伯的“去极端化反恐”措施。荷兰罗尔·梅杰（Roel Meijer）主编的《印尼、阿尔及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的“反恐”战略》（*Counter-Terrorism Strategies in Indonesia, Algeria and Saudi Arabia*, 2012）一书系统地阐述印尼和沙特阿拉伯的“反恐”战略。作者将印尼和沙特阿拉伯的“柔性反恐”战略进行比较，认为印尼的“柔性反恐”战略既包括对恐怖主义的康复计划，让恐怖主义康复后重返社会；既包括在意识形态上对恐怖主义进行说服教育，又包括对人权的尊重。具体措施包括对被释放的恐怖主义者给予财政支持和奖励、将当地警力的职能从军用转为民用服务，以及发动民间社会参与“反恐”活动。尤其是各种穆斯林团体参与“反恐”活动的成效尤为突出^①。与印尼“柔性反恐”相关的著作为《预防极端化和恐怖主义：基于印尼的研

① Noorhaidi Hasan Bertus Hendriks,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ies in Indonesia, Algeria and Saudi Arabia*,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2012, p. 169.

究》(*Preventing Violent Radicalization and Terrorism: The Case of Indonesia*, 2009), 探讨了印尼的“柔性反恐”措施并给出了一些相关的建议。

第二方面, 非西方的研究。

除了西方的研究著述外, 非西方世界对美国的国际“反恐”也做了大量的研究, 本书也参考穆斯林世界在该研究领域的一些文献。巴基斯坦作为美国主导联盟的前线“反恐”国家, 与“反恐”问题休戚相关, 该国学者对恐怖主义及“反恐”的文献也应运而生。巴基斯坦《国际新闻》副主编阿米尔·米尔(Amir Mir)在《“9·11”以后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化》(*Talibanisation of Pakistan: From 9/11 to 26/11 and Beyond*, 2010)一书分析了“9·11”后巴基斯坦面临“塔利班化”的各种危险。作者除了介绍“圣战者组织”(穆贾赫丁)武装组织的历史根源、恐怖头目的背景和恐怖组织的现状外, 认为“9·11”事件后恐怖主义聚集于巴阿边境地区这一事实不仅对美国主导的“反恐”联盟构成威胁, 而且也危及印度和巴基斯坦自身的安全。此外, 作者还仔细分析为何巴的“反恐”合作受到美国怀疑, 认为巴为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 巴军方不可能全力以赴地打击伊斯兰武装分子。DR. 纳兹鲁尔(DR. Nazrul)的《伊斯兰的“9·11”和全球恐怖主义: 观念和方法的研究》(*Islam 9/11 and Global Terrorism*, 2005)论述了“9·11”后为何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支持恐怖主义, 同时探讨了穆斯林憎恨西方的历史根源, 以及极度敌视现代化的原因。

印度学者 V. D. 乔普拉(V. D. Chopra)的《美—英在伊拉克军事行动的形成与终止》(*Genesis and Fall out of U. S. - U. K. Military Action in Iraq*, 2004)对美英联军以伊拉克拥有大